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孙子学史研究专题

古书新证:抗战时期“从孙子兵法论日本必败” 相关言说探析

高加康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 214153)

摘 要: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社会各界对战争前景忧虑重重。在此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注重从文化层面构建抗战理论基础与必胜信念,积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武器与理论支撑。作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孙子兵法》成为“文化抗战”的重要理论资源,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从孙子兵法论日本必败”的相关言说。这些内容通过检讨抗战初期中方对敌策略、分析日军侵华战略、展望未来战争走向,系统论证了“日本必败”的必然性。通过激活《孙子兵法》的古典智慧,中国在全面抗战前期的军事弱势中确立了道义和智识上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更彰显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在现代战争中的独特价值与深远意义,为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支撑,成为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抗日战争;《孙子兵法》;日本必败论;文化抗战;现代战争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6.03.004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面临着军事装备和工业基础远逊于日本的严峻现实。尤其是全面抗战前期,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中国社会各界对战争前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忧虑。在此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文化层面构建抗战的理论基础和必胜信念,积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武器和理论支撑,纷纷“以笔为戎”,撰写和出版提振抗战信心的作品。

作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孙子兵法》自然成为众多知识分子投身“文化抗战”的重要理论资源。时人注意到,《孙子兵法》作为中国传统的军事典籍,却常被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加以利用。“日本军人,其实不仅限于军人,对于孙子的研究很热心,对于孙子的理论很崇拜,他们也很自信能够得着孙子的真谛。”^{[1]17} 这使当时的

中国学者深感痛心与愤懑,同时也激发了他们深入挖掘《孙子兵法》真义,以正本清源、夺回话语权的决心。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兵学逐渐向现代军事学转型,对于被称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时人既保留了考据功底,延续传统注疏与考据方法,又引入西方军事理论,注重比较研究,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凸显其实用价值。^[2] 其中,出现了许多“从《孙子兵法》论日本必败”的相关言说,这些作品的著者身份多样,既有坚守书斋的文人,也有政府部门的职员,更有拼搏战场的将军。然而,当前学界对民国时期《孙子兵法》的研究中对这一相关内容注意较少,本文将以抗战时期“从孙子兵法论日本必败”相关言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这些言说的核心论点及其在抗战中的特殊意义。总的来看,这些相关言说的内

收稿日期:2025-07-17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政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24JDSZK166)

作者简介:高加康(1997—),男,山东滨州人,助教,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E-mail:dggjk@foxmail.com

容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总结经验,对过去中方的抗战策略进行检讨;二是立足当下,分析日军侵华的各类战略;三是展望未来,从多角度分析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必然失败的命运。

一、检讨抗战初期中方的对敌策略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对敌策略,组织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多次大规模会战,投入大量兵力与日军正面交锋,以空间换时间,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其进攻速度,体现了其抗日的决心和努力,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为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创造了条件。^[3]然而,这一时期,国民党片面强调阵地战、消耗战,战术较为呆板,未能充分发挥中国军队的优势,导致自身伤亡惨重。面对前线局势,当时社会上对抗战的走向产生了不同认识。部分人因前期中国军队消耗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将进入相持阶段视为战略转折点,认为日军进攻势头已被遏制,中国有了更多时间调整部署、积蓄力量,对抗战最终获胜充满期待;但也有一些人因正面战场部分战役失利,觉得中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日军仍具备强大实力,担忧中国难以在相持阶段支撑下去,对战争前景持悲观态度。^[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有关“从孙子兵法论日本必败”的言说大量涌现。

著名抗战文人钱基博对《孙子兵法》研究颇深,曾多次赴军队为前线军士讲演《孙子兵法》。1939年5月,钱基博撰写的《孙子章句训义》出版,他在该书序言中以《孙子兵法》中的兵法理论阐述了抗战中日本必败的原因。^[5]¹⁴⁶1942年这篇序言被《大中国》杂志以《从孙子兵法论日本必败》为题再次发表,后《孙子章句训义》于1942年、1947年又出增订本,该序言均作保留,内容并无更变,但并未冠以任何题目。在这篇文章中,钱基博以《孙子兵法》中“强而知避”的理论阐述抗战前期中国对敌策略。他指出,在抗战前期,面对日军进攻,中国军队避免正面硬拼,采用“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之法,符合《孙子兵法》的治气原理。此外,他还以第二次布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说明面对比己方强大的敌人时“强而避之”的重要性,“敌进,则我退以避其锐;敌退,则我扰以乘其惰;务使敌不得用其锐,而养

吾全锋以徐制其后”。钱基博认为,中国抗日也应如此,“故控其力,待日军弊显再制胜”。他引《孙子兵法》及历史战例,强调“能逃”、“能避”以保存实力,利用持久战术消耗日军,最终实现以逸待劳之效,肯定了抗战前期中国采取的对敌策略。^[6]

对于抗战初期中方的对敌策略,国民党军人李则芬同样认为体现了《孙子兵法》所强调的“避”的战术。1939年,李则芬出版了《以孙子兵法证明日本必败》一书,该书运用孙子的兵法原理,深入剖析了日本侵华战略的必然失败。作为久经沙场的国民党军人,李则芬曾随陈诚左右参赞戎机,非常熟悉正面战场上的中方对敌策略。在本书中,李则芬肯定了中国在抗战中采取的“避实击虚”策略。他强调,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避免了与日军进行大规模正面决战,而是采取了游击战等灵活战术,这与《孙子兵法》中“避实击虚”的原则相契合。他通过山西和山东等地的战例,说明了游击战在消耗日军实力、牵制其兵力方面的有效性。^[1]⁵⁹⁻⁶²

此外,曾担任抗战时期浙江通志馆编纂的杭州学者邓治欧也从《孙子兵法》中的“避其锐气,击其惰气”理论出发,反驳了国内失败论者和汉奸关于第一期抗战失败的观点。他认为,抗战初期中方放弃广州、武汉后开展第二期反攻是正确的,因为“武汉的会战,可以说是敌军攻势极点,而至于再衰三竭的时候,正是我开始第二期反攻的时候”。作者以白崇禧的观点佐证,“目前敌人是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当我们采取四月攻势的时候,敌人所有的在华兵力,只能被动地应战”。而对于敌军已经占据的地区,邓治欧指出,日军只不过是“挂”在那些地方,并不能长久地待下去,“在山西的敌军,是挂在中条山。豫鄂皖的敌军,是挂在大别山脉,湘赣的敌军,是挂在幕阜山脉。其他所挂之处,不胜枚举”。接着,他引《孙子兵法》中的“凡军喜高而恶下,贵阳而残阴”内容,说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方的游击队在作战中占据有利地形,使得日军“惶恐万分”。邓治欧认为,按此策略抗战,既能粉碎敌人“速战速决”、“速和速结”的阴谋,也能稳固中方胜利的基础。^[7]⁵⁻⁶

1939年12月,国民党取得粤北战役第一阶

段的胜利,著名军事学家李浴日以《孙子兵法》的《计篇》与《地形篇》分析了中方取胜的原因。他认为,中方在战役中充分利用了粤北地区复杂多变的地形,设置了伏击圈和阻击阵地,使敌人陷入困境,“粤汉铁路与各县公路早经我破坏,使敌的战车与重炮,不能前进参加战斗,即飞机因草木云雾的障碍,亦不易找到投弹的正确目标”。^{[8]298-303}另外,李浴日还从将领性格、作战计划、知彼知己等角度分析了中方胜利的原因。

不同于上述对抗战初期中方对敌策略充分肯定观点,吴景洲则认为抗战初期中方的对敌策略导致了一些后果,如领土及资源的损失、物价高涨等,但这些后果尚处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中方所失之地多产粮少,资源不易立即开发利用,且后方生产和友邦接济可弥补部分损失;物价高是战时常见现象,吴景洲引用《孙子兵法》“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之理,期望通过人事改良和增强爱国观念平息物价。相较于“失”的一面,吴景洲认为抗战初期中方的对敌策略更多的是“得”。首先,吴景洲强调“师直”,指出抗战是为保卫国土和民族生存,反侵略、维正义,师出有名,能振奋士气。其次,中方采取“以逸待劳”策略,敌攻我守,占据主动。再次,通过民众在沦陷区行动受刺激后相率来归、二十八国同盟支持、国家总动员法实施等事实,证明中国士气未衰。此外,他援引《孙子兵法》中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认为除少数轴心国外,多数国家与中方联合,形成得道多助局面,是一种“伐交胜利”,而敌方仅靠“伐兵”与“攻城”,处于下风。^[9]

总的来看,钱基博、李则芬、邓治欧、李浴日等从不同角度充分肯定了抗战初期中方对敌策略。他们依据《孙子兵法》中的“强而避之”、“避实击虚”、“避其锐气,击其惰气”等理论,阐述中国军队避免正面硬拼、采用灵活战术的正确性,以历史战例和实际战况为证,强调此策略在保存实力、消耗日军、粉碎敌人阴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吴景洲虽指出策略带来领土及资源损失、物价高涨等后果,但也看到这些损失在可接受范围,且认为抗战初期中方的对敌策略更多的是带来“得”的一面。

二、分析抗战初期日军的侵华战略

抗战初期,日军侵华战略以速战速决为核心,意图通过迅速击败中国军队,迫使中国投降,以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日军凭借其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队,初期确实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然而,随着战争的深入,日军逐渐陷入持久战的泥潭,兵力分散,后勤补给困难,战略优势逐渐丧失。^[10]

对于抗战开始时日军妄想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策略,李则芬在《以孙子兵法证明日本必败》的开头就指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用兵的最高原则”,并从历史上的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说明日本善于使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以谋得利益。不过,在李则芬看来,日军忘记了《孙子兵法》“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名言,“一味好大喜功,贪得无厌,他们没有看见中华民族近年来的觉醒,在全中华民族愤怒的高潮中,日本军阀又在卢沟桥投下了炸弹,于是,全中华民族燎起抗战的火炬,发动了中日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大战,粉碎了日本‘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传统法宝”。^{[11]19}此外,著名法学家楼桐孙认为,日军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策略之所以失败,除去中国的坚决抵抗外,还因为孙子强调这一策略的前提是双方实力悬殊且对方无抵抗意志,而中国的情况显然不符合这一前提。因此,面对中方的“被迫反抗”,敌人“绝对不曾算出要和我们打大规模的仗”,违背了《孙子兵法》中的“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所以楼桐孙认为“倭是被动而战”。^{[11]22-25}

讨论战争的主动权,是这一时期“从孙子兵法论日本必败”相关言说的重要话题。李则芬结合抗战前期中日双方的多次战争,指出“日军是致于人不是致人,是被动不是主动”,并从战争开始日军便是被动、日军在上海会战是被动、战术上的主动与被动三方面加以论述。李则芬认为,尽管日军在战争初期凭借其军事优势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但这些攻势并未能改变其战略上的被动地位,“日本军阀只看见中国的黑暗方面,而对于中国的进步方面,是他永远看不见的”,这表明

日军在战略判断上存在严重失误,未能准确把握中国的实际情况,从而在战争开始时就处于被动。有些人认为“中国是应战,是不得已的被迫作战,当然战争的发动是被动,无疑地,主动权是操在日本人之手”。李则芬反驳道:“这是误以政策与战略混为一谈了。”李则芬在探讨日军在上海会战中的被动地位时,认为日本的大陆政策应首选华北作为主战场,因为华北平原适合其机械化部队作战,且能迅速捕捉中国军主力,实现速战速决。然而,由于中国军队在上海的坚强抵抗,日军被迫将主战场转移到长江沿岸,这违背了其原定的战略计划,使其陷入被动,“八一三沪战一起,随着中国军队抵抗的坚强,使日本的大军逐次投入了东战场方面,终于迫使他不得不于长江沿岸为主战场”。^{[1]58}他进一步分析,中国军队在上海会战中采取了持久抗战、全面战争和争取主动的策略,这与日军的速战速决战略形成鲜明对比。所以,中国军队通过灵活的战术运用,成功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而日军则因战略失误和战术僵化而陷入被动。^{[1]58-59}不过,邓冶欧并不认为中方从一开始就拥有战争的主动权。他指出,日本在武汉会战后已由攻势极点转为衰竭,采取了被动防守,中方结合《孙子兵法》的“庙算”理论认识到这一变化,战略便由消极防御转变为主动反攻,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7]7}

从《孙子兵法》“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兵贵胜不贵久”等内容论述日军的“速战速决”战略则是时人关注的另一重要话题。钱基博引用《孙子兵法》中“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的观点,指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若追求长期胜利,将面临兵力疲惫、资源枯竭的困境;并通过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因长期战争而耗尽国力的例子,证明“非胜之难,胜而不久之难”的道理,以类比日本若持续侵华,终将陷入同样的困境。钱基博指出,德国在欧洲大战初期采取了迅速决胜的战略,试图通过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击败对手。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德国未能如愿以偿地迅速结束战争,反而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他引用严复的观点,说明德国在战争中面临“死伤达三百万”与“军兴费重,日七八兆镑”的困境,并指出,英法采取了持久战的战略,通过疏通后路、维持海权、联合三国

等手段,逐渐消耗德国的实力,最终取得了胜利。为了增强说服力,钱基博还引用了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强调战争中迅速决胜的重要性,并指出德国未能做到这一点,从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6]13-18}对于《孙子兵法》中“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的原则,吴景洲也认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策略印证了这一兵法理论,日军耗费了大量的国力民力财力物力,导致国内经济陷入困境。同时,由于战争的持续和扩大,日本还需要承担更多的战争开支和损失,这进一步加剧了其经济困境。^[9]同样基于《孙子兵法》中的这一原则,李则芬分析了日本在持久战中的困境。不过,相较于钱基博多引外国军事经验以证本国军事策略而言,李则芬在论证方式上更加注重本国经验。

对于日军在抗战初期“三个月灭亡中国”策略的失败,相关学者也从《孙子兵法》中找到了理论依据。李则芬指出,日本在抗战初期企图通过“速战速决”的策略迅速征服中国,这违背了《孙子兵法》中“兵贵胜不贵久”的原则,日本未能认识到持久战对其不利的影响,盲目追求短期内的军事胜利,导致国力民力财力物力迅速消耗,士气低落。^{[1]19}此外,钱基博指出,《孙子兵法》中的“贵胜”与“贵久”思想需要根据主客体的实力相对而言,“然则‘贵胜不贵久’者,为攻者强者之客言之;而‘贵久不贵胜’者,则又守者弱者之主所不可不知也!”基于以上的兵法理论与国外历史经验,钱基博指出:“欧洲大战,法国福煦将军之所以挫德者以此;而我今日之所以图抗日者,亦无出于此!观法之能胜德,知我之必胜日矣!”因此,他认为日军在全面侵华初期的“速战速决”战略是行不通的。^{[6]13-18}

除日军“速战速决”策略外,邓冶欧还分析了日本在侵华战争后期企图通过“速和速结”来结束战争的幻想。所谓“速和速结”,在邓冶欧看来,就是日军“速战速决”策略失败后,先是企图勾结汪精卫拆散抗战阵营,但被蒋介石痛斥粉碎其“速和”迷梦;见“速和”无望,日军便积极推进“速结”,提出“板垣停战线”计划,想占领多地阻止各战区与中央联络、遮断国际通道,但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未能完成计划。“在南北各战场所吸收日本兵力共四十六个师团,已陷于进退失

据”,也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讲的“可以往,难以返”的“挂形”境遇,日军其所占地区多为“圯地”、“围地”、“死地”、“绝地”、“重地”,四十六个师团兵力仅能被动防御,无力继续进攻,如山西中条山多次作战都未能得逞。^{[7]6}

在时人看来,无论以《孙子兵法》的何种军事原则做分析,日军在抗战前期的侵华战略都是相当失败的。当然,上述言说对于既定事实的分析不免有些“后视偏差”。但若将其放置在抗战的大环境中考虑,这些对日军侵华战略的分析并未充满盲目的自信或是极致的悲观,仍可说是尚属客观之言。

三、论述未来“日本必败”的战争走向

在详尽分析中方与日方的各自作战策略后,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展望未来战争的走向,甚至指明战争的结果,这才是时人以《孙子兵法》论述抗战局势的最终目的。无可怀疑的是,基于中方立场,这些言说一致认为“日本必败”将是未来的战争走向。不过,需要追问的是,时人如何在千年前的古籍中发现“中国必胜”的密码所在。

钱基博从政略角度深入剖析了日本的失败命运。他指出,尽管日本在侵华过程中一度占据军事优势,但其“信己之私,威加于敌”的策略必然导致外交孤立和内政动荡。钱基博引用《孙子兵法》中“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的论述,强调日本虽表面威风,实则已陷入外交孤立的困境。他通过对比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指出德国因“信己之私,威加于敌”而导致外交孤立,最终败北,日本亦将因“威加于敌”而无法获得足够的外交支持,“德人如此!而我东邻之日本,亦将如此!”从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此基础上,钱基博进一步指出,日本在“威加于敌”的同时,忽视了内政的稳固,未注重培养国内力量和稳定,导致“顿兵挫锐,屈力殫货,民不堪命,内难将作”,违背了《孙子兵法》中“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的理论。这种内政隐患将使日本在战争中难以持久。此外,钱基博通过历史与现实对比,进一步论证了日本必败的原因。他指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行为与历史上的吴王夫差、秦始皇等相似,均因“威加于敌”而失败。同时,他也分析

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指出日本难以通过掠夺维持战争,论证了其“土崩之期,当不在远”的命运。^{[6]13-18}

日军在“不战而屈人之兵”策略失败后,提出“以战养战”策略。楼桐孙、邓冶欧认为,这一战略仍违背孙子的作战法则,日军难以获胜。楼桐孙指出,日本因战局不利,无法以国养战,试图通过掠夺中国资源维持战争,实为对侵华战争失败的供认。他引用《孙子兵法》中“因粮于敌”和“掠乡分众”的论述,强调掠夺会失去民心,并从四个方面批判“以战养战”战略的不可行性:一是现代战争兵器弹药重要性远超粮食,日本无法在中国境内掠夺到足够兵器弹药;二是日本残暴淫虐,无法在中国战地有效掠夺;三是中国已发动全民抗战,日本无法在中国境内谨养兵力;四是中国抗战力量日益强大,日本“以战养战”终将失败。^{[11]22-25}邓冶欧认为,“以战养战”战略是日本企图用经济掠夺挽回军事颓势的杀人不见血策略,其严重性超过第一期阵地战。日本意识到“国之贫于师者远输”的危险,故“因粮于敌,以足军用”。邓冶欧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是实行经济反封锁,政府与民众协同,尽最大努力收买未被敌吸收的物资输送内地,对已被敌吸收的物资设法销毁,实行经济坚壁清野与焦土政策,以抵抗日本的“以战养战”。^{[7]8}

此外,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国内一般失败论者,和汉奸汪精卫等,以为第一期抗战,我们是失败了,今后胜利仍不可期,所以受了日阀的欺骗,也吠影吠声的主和”言论,邓冶欧援引法国福煦将军的话“只有自认打了败仗的人,才是真正打了败仗”,说明精神的坚决能带来物质的充实和武力的强大,引《孙子兵法》中“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内容加以佐证。^{[7]7}

结合日军的作战策略,李则芬从军队兵力、经济困境、外交压力等方面论述了日本必败的命运。首先,李则芬指出,虽然日本运用了孙子“卒善以养之”的方法,但其军队内部存在诸多弊端。一方面,日本兵员补充面临严重困难,不得不征召其他国家人员补充兵力,从而引发其国民的反抗,加剧了军队中的民族问题。同时,日本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反战组织和行动频繁,士兵厌战自杀事件不断,显示出军队内部严重矛盾和士气

低落。另一方面,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组织了大量伪军,这些伪军内部矛盾重重,多数士兵并不真心效忠。李则芬转载了《扫荡报》、《大公报》等报刊上有关伪军反正的事件,显示出日本在利用伪军方面的失败。这些伪军组织的无效与反噬进一步削弱了日本的战争力量。因此,即使是日军运用着孙子的“卒善以养之”的方法,也只是“徒见其心劳而日拙而已”。^{[1]37} 其次,李则芬在书中详细列举了日本军费开支、通货膨胀、现金告罄等经济问题,指出日本因战争持久,军费支出浩繁,导致财政与国民经济交困。^{[1]24-26} 最后,在外交压力方面,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逐渐陷入外交孤立,与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的同盟关系未能给予足够支持,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行为强烈谴责,并采取抵制日货、经济封锁等制裁措施,加大了日本的压力。^{[1]27-30} 在李则芬看来,无论是财政问题还是外交压力,日本都是在没有认清自身国情的情况下贸然发动的侵华战争,陷入了“不知己”的困境,因此在这场战争中注定会失败。

另外,《良友》画报结合抗战的实地照片,运用《孙子兵法》中的“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上下同欲者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等内容,说明日军在抗战中面临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压力,从而论述了日本必败的战争走向。^[12]

可以看到,无论是检讨中方的对敌策略,还是分析日军的侵华战略,时人内在的目的都是为提出一种“日本必败论”做出合理性的铺垫。为使这一合理性更加完善,时人充分运用《孙子兵法》中的军事理论,将其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结合,最终完成了“日本必败”的论证。

四、结语

钱基博在《孙子章句训义》的序言中曾写道:

参考文献:

- [1]李则芬.以孙子兵法证明日本必败[M].上海:生活书店,1939.
- [2]邵青.民国时期孙子兵法研究述评[J].军事历史研究,2011,25(3):185-190.
- [3]党庆兰.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战况演变与抗战特点[J].史学月刊,2010(11):134-136.
- [4]张德明.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知识界的抗战认识探析[J].中国地方志,2019(4):112-122.
- [5]傅宏星.钱基博年谱[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6]钱基博.从孙子兵法论日本必败[J].大中国(重庆),1942,1(2):13-18.

“古书新证,必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13]12} 以这一观点来审视,抗战时期围绕“从孙子兵法论日本必败”展开的相关论述,着实做到了推陈出新、独抒新见。在这些论述群体中,李则芬立足战争实践,钱基博则注重借鉴外国军事经验。可以看到,既有从不同兵法原则阐释同一作战策略的,也有以相同兵法内容解释多个战争情形的,凸显了《孙子兵法》军事理论极大的灵活性。尽管论述者视角各异,但皆采用了“以古鉴今”的精妙策略。他们将《孙子兵法》中蕴含的抽象原则,与抗战时期纷繁复杂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摒弃了简单生硬的比附之法,展开系统且深入的分析。从政治格局的权衡、经济实力的较量、军事战略的布局等多个维度层层剖析、条分缕析,为论证“日本必败”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支撑。

尽管这些言说并未看到当时中方作战策略的失误,以及日方作战策略的适时调整,“对国内抗战形势、中国军民战胜日本的方法手段等问题的认识有所不足”^[14],但宣传的理论不应作为实战的计划加以过分苛责,抗战时期“从孙子兵法论日本必败”的相关言说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不仅为中国的抗战战略提供了理论参考,增强了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现代价值。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对《孙子兵法》的运用,本质是借助传统话语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建构。这种言说不仅提供了战略自信,更塑造了一种文化抵抗范式——通过激活古典智慧,中国在军事弱势中确立了道义和智识上的优越性,最终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思想支撑。而以后见之明观之,历史也恰恰印证了《孙子兵法》的核心论断:“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日本的僵化战略终败于中国的韧性之下。

- [7]邓冶欧. 敌方战略之总检讨:以孙子兵法证明其必败[J]. 决胜周刊, 1939, 2(21): 5-8.
- [8]李浴日. 粤北大捷特辑:从孙子兵法分析敌人进犯粤北的溃败[J]. 广东省政府公报, 1940(元旦特刊): 298-303.
- [9]吴景洲. 依孙子兵法研讨中日战争[N]. 时事新报, 1942-07-19(2).
- [10]张展. 一九三八年日军战略调整与国共抗战新格局的形成[J]. 中共党史研究, 2022(5): 130-145.
- [11]楼桐孙. 从孙子兵法断定倭寇必败[J]. 时事类编(特刊), 1939(39): 22-25.
- [12]孙子兵法图证[J]. 良友, 1940(151): 13.
- [13]钱基博. 孙子章句训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14]董灏智. 珍珠港事件前后中国学者的“日本必败论”[J]. 社会科学战线, 2023(9): 104-113.

New verification of ancient classics: an analysis of discourses on “Japan’s inevitable defeat demonstrated through the art of war”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GAO Jiakang

(School of Marxism, Wuxi City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Wuxi 214153,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ull-scal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1937,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Chinese society were deeply worried about the prospect of the war. Against this backdrop, Chinese intellectuals focused on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the conviction of inevitable victory at the cultural level, and actively sought spiritual weapon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culmin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thought, *The Art of War* became a critical theoretical resource for the “cultural war of resistance”. During this period, a large number of discourses related to “demonstrating Japan’s inevitable defeat through The Art of War” emerged. These contents systematically proved the inevitability of “Japan’s inevitable defeat” by reviewing China’s strategies against the enemy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alyzing the Japanese army’s aggression strategy in China and forecasting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war. By activating the classical wisdom of *The Art of War*, China established its moral and intellectual superiority amid its military disadvantag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This superiority not only greatly boosted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confidence in the inevitable victory of the resistance, but also highlighted the unique value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ilitary thought in modern warfare. It provided indispensable ideological support for the final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became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cultural war of resistance.

Key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Art of War*; the theory of Japan’s inevitable defeat; cultural war of resistance; modern warfare

(责任编辑:许 金)

引用格式 高加康. 古书新证:抗战时期“从孙子兵法论日本必败”相关言说探析[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 2026, 43(3): 21-27.
Gao Jiakang. New verification of ancient classics: an analysis of discourses on “Japan’s inevitable defeat demonstrated through the art of war”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2026, 43(3): 21-27.